



倒转“红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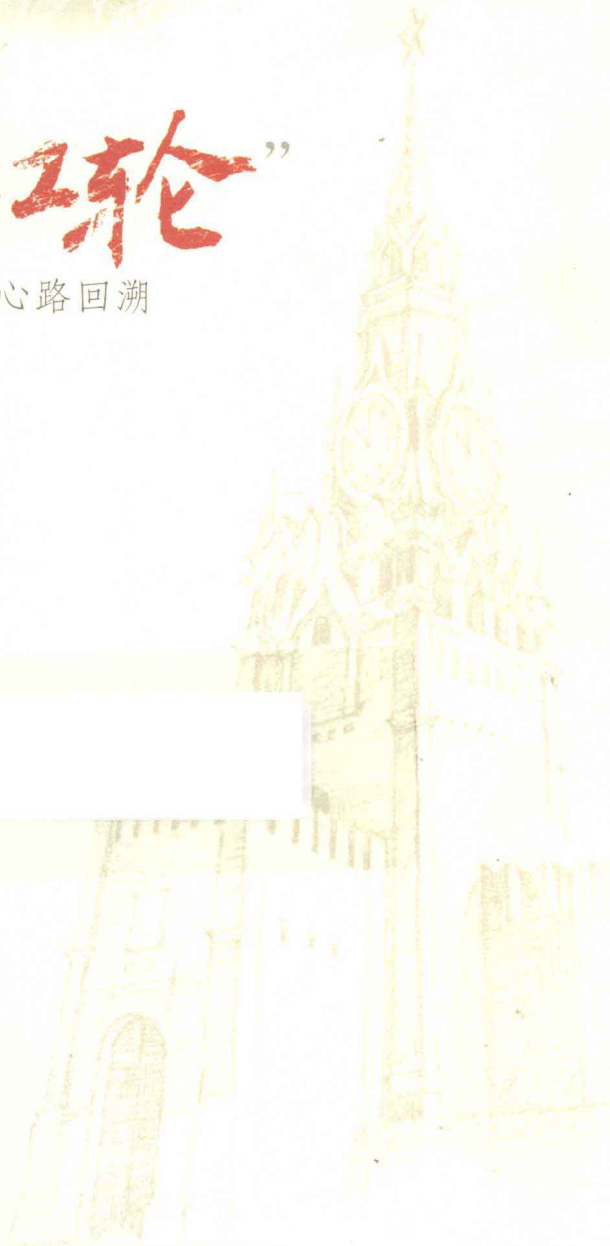
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从专制到改良

从改良到革命

从革命到革命后的反思

金雁 著



倒转“红轮”

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金雁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 金雁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301-20915-8

I. ①倒… II. ①金…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俄国

IV. ①D75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47389号

书 名：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著作责任者：金 雁著

责任编辑：岳秀坤

排版制作：思想工社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0915-8/K · 087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5毫米×965毫米 16开本 44.25印张 500千字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6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自序

几个月前我就央求秦晖给我这本书写个序，指望他能够有个提炼概括，能从理论上有个整体把握，因为是他催促我把这些已经搁置了有些时日的文字拿出来的，而且他对我的思想形成过程比较了解，不需要从头到尾去读完全书。谁料这位仁兄一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自己的事情都应接不暇，对我的请求不说应也不说不应，就是哼哈应付着不见行动。罢了，让他这么耽搁下去还不知道要拖到猴年马月了。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自己向读者作一番交待吧，讲一讲我从事俄国知识分子研究的“心路历程”。

很多读者可能会有的第一个疑问是，既然现在国内已有不少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专著，你再写一本，有什么独到之处？如果只是大同小异的同义重复，又有何必要呢？的确，像我现在这种既没有需要充数的“科研成果”，也没有其他方面考虑的人，写东西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心探寻的驱使，既不需要谄媚权势，也不需要制造“史学泡沫”和“学术垃圾”，出手的东西肯定有自己的一番考虑。我一直尝试用长时段“立体”的“叙事方式”去“解读”俄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我并不力求建立什么“范式”，只是希望对俄国各种知识群体有一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厘清表现在显性层面背后的线索。

我对俄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感觉由来已久，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多少都有点“苏联文学情怀”，用现在时下的话说是“苏联文学控”，那个时候痴迷俄罗斯作品几乎是一代人共同的经历。除了时代背景的提供以外，俄语的普及和翻译曾出现过任何一个语种都没有的“全民热”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我因为上学早一些，所以爱好趋向都是向上靠，愿意和年龄比我大的高初中生“混”在一起，热衷于追逐他们谈论的话题，所以小学后期和“文革”中

间阅读了大量的苏俄文学作品。但是毕竟因为理解有限，那时候主要喜欢有曲折故事情节的作品，基本上锁定在反特、侦探、战争、爱情文学之类的著作，以能在同龄孩子中讲故事的“臭显摆”作为动力。当时看书遇到时代背景、遇到深层思索的东西都跳过不看，也记不住那些绕口的俄语人名和地名，尤其不喜欢所谓“黄金时代”那些代表性人物的东西，比如我嫌托尔斯泰的作品太拖沓，故事情节不紧凑，社会背景的交待、一个舞会、一次谈话都能花费那么多笔墨，为了尽快知道《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与安德烈之间故事的发展，就只挑有故事情节的段落阅读，把我认为无关紧要的篇幅都略过去。我特别理解当时俄国有些读者曾向托翁写信、要求删除“文学之外”的哲学议论和繁琐的背景介绍，因为我就是这样想的，特别有同感，假如我是和托翁同时代的人，我也会写类似的信、提同样的要求。再比如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太晦涩、太阴暗、太极致、太疯癫怪诞，感觉文字背后还有读不透的东西，老有在“地下室”的迷宫里穿行的感觉，压抑的人透不过气来，以我当时的年龄实在感到大惑不解。在我看来，这些大部头都可以缩编成小册子，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曾经干过把某些小说的结尾撕掉，自己用作业本重写一个自认为满意的结局而用浆糊贴上去的狗尾续貂的傻事。

“文革”中的文化荒漠以及个人境遇使我对俄罗斯作品的体会更深了一层，加之当时可读的书籍极其贫乏，有些作品会反复阅读，越到后来我就越偏重于读社会背景的描写，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倒显得无关紧要了。插队期间，我在父亲的指导下通读《列宁全集》，为了辅助了解背景知识，又自学了安非莫夫四卷本的《世界近现代史》，70年代学俄语以后，又自学了潘克拉托娃三卷本的《苏联通史》。这时阅读的偏好发生了进一步的转移，已经不喜欢苏联文学了，只对“黄金时代”的作品感兴趣，对那个我曾经认为晦暗的沙俄时期充满了极大的好奇心，非常想了解我们这个最大的邻居在19世纪的社会状况。

有一个阶段我突然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很着迷，把当时能搜罗到的他的作品逐一阅读。记得70年代有一次拿到陀氏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从晚上自习时开始阅读，到宿舍11点熄灯，再到打着电筒顶着被子继续读，电筒

的电池耗光以后，又燃起蜡烛读，整个过程感动得稀里哗啦，泪水止不住地流，为了不使抽泣声影响到其他人，我用毛巾堵着嘴，到了清晨，我两只眼睛肿成了一条缝，还抱着书久久不愿撒手还给别人，似乎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开始有所顿悟了。读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后，我和同学约定比赛，看谁更能吃苦、更有毅力、更能抗得住心理打击、更能在逆境中成长。再往后又对国内出版社内部刊印的“黄皮书”趋之若鹜，70年代出版的《叶尔绍夫兄弟》、《热血》、《你到底要什么？》、《普隆恰托夫经理》、《州委书记》成为我们俄语班几个女生热议的话题。可以说，那个年代如果没有这些作品相伴，我的人生该是多么孤寂和无趣，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作品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因素。

所有这些看似无心杂乱的积累后来都成为我1978年考苏联史研究生的知识背景。1978年重新再回兰州大学读书，学校的氛围与70年代中期大不相同，能够在课堂上与导师和师兄们就我心仪已久的俄罗斯问题一探究竟，是我那些年最开心的事情。也许是我这个“弃农经商”者（师兄们对我从外语转到历史的昵称）基础比较薄弱，对别人见怪不怪的问题也总要问“为什么？”也许是苏联时期的教科书过于程式化、千篇一律，很难解惑。在学校里我一直是“问题学生”，总是“纠结”在一大堆的问题中得不到答案，很多问题跟了我一辈子，一直萦绕在我的脑袋里。因为工作关系，我的研究曾先后“分叉”到东欧现状、苏共历史问题当中。记得1982年初我刚到陕西师大苏联历史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我就对杨存堂老师说，“你们大家做‘桌面’搞苏联史研究，我当‘桌子腿’继续我的俄国中古和近代史研究。”这个愿望没有获得支持，我只好“转战”到现代史领域。现在想来，想“当桌子腿”这话一晃30年过去了，总算可以还一还历史“旧账”了。

很早我就注意到俄国史研究中的一些不合常规的奇怪之处，于是我自己总结了俄国史中的几大怪：

第一怪，农奴身份很难猜；

第二怪，农民把沙皇当父亲来看待；

- 第三怪，地主、军人分不开；
- 第四怪，知识分子天生爱捣蛋；
- 第五怪，僧侣子弟“激进”大比赛；
- 第六怪，多一手指划十字，千百万人逃亡在外；
- 第七怪，总是有人喜欢向后看；
- 第八怪，企业家支持反对派；
- 第九怪，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保守派；
- 第十怪，被赶出国门的人再度热起来。

至于在这些“大怪”之下的“小怪”就更加多得不计其数。

比如在1762年俄国“贵族解放法令”，我一直纳闷，西欧没有给贵族“自由”这么一说，中国也不会有地主解放法令，难道说贵族也是“被奴役”的，那还叫什么贵族？再比如，作为苏联知识分子第一人的高尔基，每一个阶段的“变脸”都叫人瞠目结舌，至于这背后的为什么，很少有人去深究。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这一届研究生四人毕业后参加孙成木、刘祖熙老师主编的我国“文革”后第一套《俄国通史》的撰写，其跨度从原始社会晚期到近代，结果每个人都在讲，公社制度处在瓦解阶段，最后瓦解了一千多年，到十月革命后还有95%以上的土地和人口都在公社中，岂不怪哉。另外，我很早就注意到，平民知识分子一直就自恃“道德海拔”比贵族知识分子高，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沙皇时期就有“阶级出身”这么一说？另外，为什么知识界会形成一部分人向内用力、另一部分人向外用力的局面呢，而且还会“隔代遗传”？俄国历来是自由主义者注重政治体制的变革，强调“政治自由”和“宪政民主”的重要性，而民主主义者则高举分配公正的大旗，把政治改革叫做“资产阶级的骗人把戏”，这种价值差异是怎样形成的？我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有，列宁除在与自由主义“文字联盟”的时候，狠批猛打过民粹主义以外，以后不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策略上，都越来越倾向于民主主义，反复强调“要划清民主派和自由派的界限”、“这两种思想之间横着一条鸿沟”。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以至于经常出现“此列宁”与“彼列宁”“两个列宁”“打架”的状况，这

又是为什么呢？

这种“不解之问”还有很多很多，如果照此罗列下去，恐怕几张纸都写不下。如碰到这样的问题，我的学生都借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俄罗斯是矛盾的、用理性无法解释的，似乎把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而不去解其中之“味”。

对我来说，这些“为什么”不搞清楚自己心里的“坎”就常常过不去。说实话，在很大程度上，我做学问的动力首先是为了自己“解惑”，在一个问题没有弄明白之前，我充满了干劲，在梯子上爬上爬下翻资料查原文，坐在一大堆书籍里灰头土脸地寻求答案，但是往往一个问题套着另一个问题，问题越追越多，自己一下陷进去出不来了，到最后初始的问题已经忘记而后续的问题却滚滚而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写成文章发表的东西并不多，而是留下了一堆凌乱的手稿和电脑里的大量资料卡片、乱发议论的感想和起头写了半截的文章。我曾经自嘲，按照现在的评估体系，等这些疑惑想通了再动手写文章，别说评职称了，每年的考评都过不了关，而我恐怕早就下岗了，连饭都没得吃。

破解俄国知识分子的“斯芬克斯之谜”，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愿望，这些年断断续续地一直在做积累工作。其实现在拿出来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仍是一个思想过程的“半成品”，不是我最后想要的东西。这倒不是指文字上或结构上的不完整，而是指我的思考仍在继续，问题的“辐射”面也在不断扩大，总感觉结论不够完善，资料不够丰富，有些结论似乎显得有些仓促和不定形。但是近年来一些好朋友的相继离世，使我患上了一种“时间恐惧症”，加之眼睛老花，在电脑上工作的时间缩短了，我真怕有一天眼睛出问题了，电脑里留下一堆只能自己看懂的感想、摘录和卡片，会给秦晖造成很大的麻烦。我们两个曾经有过一个相互约定，谁走在前面，走在后面的那个人有义务为逝者完成大量的半成品和文稿整理。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先走的人是幸福的，谁后走谁悲惨，试想一下守着电脑里数不清的不是自己本专业的东西，整理的难度该有多大。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秦晖催促我赶紧把成形的东西整理出来。他说，只为自己一个人做学问未免太自私了点，你与

其坐在隔壁房间里一惊一乍地大喊大叫“原来如此！”，或者给我一个人讲你的研究心得，不如把阶段性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也能一同分享。一来是对一个时期有个交待，即便以后思想发生变化或者发现新史料，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修改蓝本；二来，每一个时间段都有这个阶段的认识水平，从来没有一个人一定要彻底想通了才动笔，因为思想认识的过程是无穷尽的，总不能所有的问题都要等到快咽气的时候才叫成熟。

所以我决心近期内把电脑里的东西整理出来，《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是第一本，第二本是谈苏联一党制的，暂定名叫《历史的化装舞会：俄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变迁》，第三本《从人民之子到人民之父》是讲民粹派的。我已经想好了，再不铺新的摊子了，要是能把这几本书都完成了，我就退休写“闲书”，讲好玩的故事。秦晖一直认为，我写的文章没有我讲的故事生动有趣，那我就写些有意思的文章，但愿能够如愿。其实我也知道这已经设想好的每一步，真正落实起来都要比预想的计划困难和漫长得多，而且解惑过程是会不断延续下去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疑惑又出现了。

我在这本书里把我对“几大怪”的解惑过程告诉大家。有些问题与知识分子这个话题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无疑有助于了解知识分子的种种特点的来历和背后的“所以然”。由于传统的解释模式存在着明显弊病，有太多范式陷阱，尤其是斯大林的依次递进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建立以后，阶级斗争模式下的社会进化理论遮蔽了其他所有的社会矛盾，这种规律化的归纳方式，把所有国家民族一律都按五种社会形态划分，即便不符合的也要削足适履硬往上套。这种写史方式既让人们无法知道俄国的特点是什么，更无法从一个更宽阔的角度去观察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一直主张把整个俄国史拉通了去思考，因为我感觉历史研究不管是断代史还是专门史，如果割裂开来，缺乏历史的整体感，就像是盲人摸象，只摸到了一个局部就妄称是大象的全部，在整体上很容易陷入“此矛刺此盾”的矛盾之中。所以我在这部偏重思想史的著作中，又有大段制度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内容，然后再用我个人

的理解方式做出解答。

关于第一怪，“农奴身份很难猜”。按理说，农奴制是世界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各国之间有一些差别，但共性都是劳动者身份沦落后的一种被迫依附关系。记得1980年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当时还是我小师兄的秦晖就曾经问我，为什么俄国的农奴又交租来又缴税，而西欧的农奴和中国的部曲、私属、佃客这类身份的人是只交租不缴税，由于他们人身依附于农奴主，直接统治者是领主，原则上不与国家发生关系。我当时以常见的教科书语言回答他，“那是因为俄国的农奴受到国家和农奴主的双重剥削”，应该说这样的回答并不算错，我能解释为什么西欧和中国的农奴免除了国家盘剥这一层，但是却一时说不清楚俄国农奴的双重身份的来历。其实像西欧那种农奴俄国也有，波雅尔土地上的奴仆就不缴税，但俄国更多的是以另一种身份介于国家纳税人和私人农奴之间的“地主农民”。

我1978年作苏俄史研究生的时候，读过1861年2月19日废除农奴制的《宣言》，该《宣言》的奇怪之处在于，特别强调解放农奴是贵族的历史功绩，是他们自愿放弃已经拥有了几百年的权利，只有在他们慷慨的举动下农奴才能成为“自主农民”。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理解这些话的，反正我觉得不可思议，虽然农奴解放从实际上并没有损害到农奴主的利益，但毕竟沙皇政权又不是共产党搞土改，既然农奴制是从老祖宗那儿传下来的，贵族为什么会齐步走地一同自动放弃呢？传统的说法是农奴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农奴不断起义。农奴制阻碍生产力此话的确不假，但谁都知道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被镇压以后，俄国于19世纪再没有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而且俄国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哥萨克起义，与农业省份的农奴并不相干，显然这不是主要原因。

这就无法解释这第二怪：“农民把沙皇当父亲来看待”。搞俄国史的人都知道，俄国农民中奉行“皇权主义”，一直到1907年斯托雷平改革造成了俄罗斯社会文化的“不对称性”以前，沙皇总是扮演“人民之父”的形象，俄国农民对高高在上的权威充满虔诚和浪漫信任，关于这一点也体现在农民反抗的形式上。中俄传统时代都有大型的“农民战争”，而西方无法与之

相比。在西欧，农民与领主发生冲突，如果在小共同体内不能调解，就会要求国王出面调解，英、法的农民起义实际上都不过是向国王的“武装请愿”或宗教战争。而中国的农民战争大多是超大型的反官府运动，在农民心目中朝廷与地方官吏没有明显的界限，不反则已，一反就要以改朝换代为目标，就像《水浒》中李逵说的，杀到东京夺了鸟位。俄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主要都由哥萨克的自治村社发动，而非农奴造反，而且多表现为拥护“好沙皇”而反对贵族，乃至以假沙皇反对真沙皇，在农民看来，贵族和官吏是人民和沙皇之间的障碍，但从不否认王朝的合法性。时至今日，“沙皇”仍是一充满敬意和褒奖的称谓。这里面就必须解释，国家既然盘剥农奴，农奴却对沙皇信任的原因。

至于这第三怪，“地主、军人分不开”，也与前两个问题有关联。在俄国服役军人（служилые люди）、军功贵族（дворяня）、农奴主（крепостник）、地主（помещик）其实就是一类人，也可以说是同一种人不同时期的称谓，他们是由军人到贵族，从贵族到农奴主再到地主这样一个递进关系。谁都知道，农奴主需要农奴（即地主农民），但是俄国的农奴是因为打仗需要军人，而军人需要农奴，于是国家便立法把自由村社上的农民变成了农奴，作为给军人的酬劳，并说好了，是以军人服役为条件借给军人的，只是农奴临时的主人。于是俄国的农奴就成为双重身份者，他们的经济和人身从属关系是“一肩挑二主”，一方面国家纳税人的身份并不改变，名义上他们仍是国家的人，另外他们作为国家付给军人的酬金以自己劳动替军人种地。说白了，就是国家暂时叫军人“代管”纳税人，并把它们的部分劳动支付给军人。

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地主农民即农奴同时肩负着国家义务和地主义务，他们彼此之间势必会争夺对农民的使用权，政府希望军人在满足国家的前提下使用劳动人手的剩余劳动，所以会出台约束地主的法令。而农奴主则相反，因为他们是农奴的直接主人，总是以满足自己为先，满足国家次之。于是在俄国农民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沙皇是好的，只是老爷们太坏。由于沙皇从来就“未曾沦为单纯的贵族利益的传声筒”，国家和贵族之间一

直就存在着发展方向上的分歧。用赫尔岑的话说，从服役军人中成长起来的贵族知识分子身上“先天地就具有革命的酵母”。

接下来逻辑发展就会落在第四怪上面，“知识分子天生爱捣蛋”。很多人都已经指出过，与中国科举形成的知识阶层“读书服务帝王家”的“入世情结”不同，俄语的知识分子一词——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原意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是指那些“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的目标”的人。那些从军人转化成贵族知识分子的人，在18世纪以后与专制制度就存在着“离心力”。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在亚历山大二世安葬的悼词中说了颂扬沙皇的话，导致十年来许多学生都不原谅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再比如，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爱忏悔，这种俄国式的忏悔和天主教的表达形式不同的是，不是悄声面向神父一人，必须是大声当众说出自己的罪恶。越是完美的人就越要在“人民”面前承认有罪，检讨自己不同于“人民”的地位，检讨自己的养尊处优。当然肯定不能以俄国贵族的人格高尚来解释其中的原委。这又是为什么呢？只有把前三个为什么解释清楚了，结论自然而然就会出来。

这第五怪是“僧侣子弟‘激进’大比赛”。俄国社会学大师米罗诺夫说，直到现在研究者们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僧侣中会出现大量的激进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注意到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僧侣出身的“平民知识分子”与政治“激进主义”之间的正相关。这批在19世纪6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生代”，几乎颠覆了19世纪4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一切方面，他们表现出来的横扫一切的虚无主义、好斗的社会革命热情、道德为目的服务、人民崇拜、灌输论者、实用主义的功利化倾向都与此前温文尔雅“书卷化”的“伤感主义”和“纯思辨”的贵族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这些被称为“着了魔”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一代人”，对贵族知识分子的“矫枉过正”跨越幅度之大几乎颠覆掉了他们前辈所有的积累，就像有一道历史的“切口”把二者割裂开来。不但如此，平民知识分子还对贵族知识分子抱有强烈的义愤。他们自称与贵族知识分子毫无共同之处，是两个相互敌对的思想圈子，有时经常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主义和自由

主义两大流派的分道扬镳。而与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有继承关系的是民粹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路标派则自称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之子”，接续的是“黄金时代”的思想。对立的双方在张力两端较劲，思想史的斗争就一直延续下来。

为什么俄国知识界会有这种时间断裂和阶层仇恨呢？知识界因为其认识不同都会出现分裂，抛开俄国这些官方与民间的对立不说，仅就反对阵营而言，其分裂程度之大，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如果局限在思想史，线索依然不够清晰，从大背景说是因为俄国社会分裂严重的程度所导致的，而他们的思想论战在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下被贴上了标签，使人无法深入一探究竟。至于具体说到占俄国人口总数0.9%的僧侣阶层为什么在革命队伍中贡献了多达22%的骨干力量这一奇特现象，就要从这个等级的形成机制和17世纪的宗教“分裂运动”中去寻找原因，我也在本书中力图解答“米罗诺夫之问”。

至于第六怪，“多一手指划十字，千百万人逃亡在外”；第七怪，“总有人喜欢向后看”；第八怪，“企业家支持反对派”都涉及一个俄国史书上很少提到的宗教“分裂运动”。以前我在学俄国史的时候也知道“尼康的宗教改革”，也知道民间有很大部分人反对这次改革，但是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究，甚至对“分裂运动”这个名词印象都不深刻。我是1990年在别尔嘉耶夫的《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一书中第一次对“分裂运动”有了深刻的记忆，正是因为别尔嘉耶夫不断地提到“分裂派”、提到17世纪被国家定为“异教徒”的这些人存在及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我感觉到它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过程有关，也与俄国思想史有关，知道这个历史抗争一直延续了250年。但是翻看了很多文本的俄国通史，苏联时期的教科书简单了了的说一些“迷恋细节”的人抱残守旧，不能解决我心中的疑惑，甚至就是在苏联官修正教史的书中，记载也不充分，或者把这种现象作为“非正统”的“邪教”一通贬损，而缺乏客观的描述，让人很难看清分裂运动的全貌。^{〔1〕}我就不明白这两个手指头划十字和三个手指头划十字倒是有多大的区别，以

〔1〕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就有很多史家专门投入分裂教派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尼科利斯基教授的研究最为全面。1953年苏联出版了9卷本的《阿瓦库姆资料集》及一系列相关著作。

至于俄国有那么多的人宁肯自焚也不愿意改变？这便触发了我的好奇心，此后坚持“老规矩”的“раскольники”就像一个谜一样困扰着我，为了使自己搞清楚，也使关心俄罗斯思想史的人解惑，回答这几大怪是为什么，于是就有了关于“分裂运动”的研究。

俄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群体，国内从未有人对他们做过详细的区分。本书采用的是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把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都做了自己的分析和解释，另外还对两个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索尔仁尼琴和高尔基进行了个案研究。我原来准备一共写七章，结果在实际写作过程中，第三、第四、第五章的篇幅都大大超过预想，所以就这三个过大的章节一分为二，这样就有了现在十章的体例。

第一章从索尔仁尼琴去世和他的长篇巨作《红轮》作为切入点，把他与俄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宗教“分裂派”的领军人物阿瓦库姆作了一个“链接”，可以从这个长时段看出索尔仁尼琴反共产专制的思想背景和历史资源，他身上具有浓厚的俄罗斯弥赛亚情结和民间东正教人道主义的色彩。他一再强调自己“对俄国历史基础专一的信仰是对没有根基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抗衡”。^{〔1〕}据说索翁的皈依基督来源于一个故事。虽然他的母亲是虔诚的正统教徒，他的亲属中却有人是分裂教，他在60年代就有强烈的宗教倾向，但是真正的动因是1970年他在塔什干作癌症手术的时候，在手术做完的后半夜，他在黑暗中与躺在另一个手术台上的一位东正教囚犯进行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谈话。那个看不清面孔的病人向他讲述了自己从一个犹太人改变信仰，成为东正教徒的心理历程，他在一瞬间感觉到黑暗中的光芒笼罩着他的全身，他顿悟到，治疗人类腐烂的心灵比治疗肉体的创伤和疾病更为重要，这位神秘教徒在与索尔仁尼琴交谈完后很快就死在了手术台上。索尔仁尼琴认为这是上帝的有意安排，这是上帝借“病友”之口对他的暗示和召唤。后来他常说，“如果没有敬畏之心，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

大部头的《红轮》在中国翻译出版以后，虽然也获得一些出版奖项，

〔1〕索尔仁尼琴：《红轮》，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册，692页。

但读者反响并不太好，人们感觉到这位有着世界文学史上最高声誉的泰斗级大师的作品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好读和引人入胜。这并不包括价值评判，而仅仅是从审美意义上来说，他们认为《红轮》作品类别难以界定，说小说不小说，说历史不历史，既没有小说的生动和完整故事，也缺乏历史的应有的交待和论证，简直就像一大堆没有整编的史料堆砌在一起，随便穿插一些不知所云、没头没脑的人物和情节。有人说，肯定没有哪位读者会有兴趣随着他的笔触从头看到尾，真不知道为什么索氏要费尽毕生之力，写这么一套注定不可能在民众中普及的超大型巨著。

我以前在文章中说过，在历史上，俄国文学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学科”，以至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这些今人看来的“一级学科”都是从“文学”中衍生分化出来的，文学一直扮演着“思想的引领者”的角色。受托尔斯泰以降俄罗斯文学的春秋笔法的影响，索尔仁尼琴一直有一个愿望，书写一部反映20世纪初的史诗性作品，书写一部可以超越19世纪“黄金时代”文学顶峰的作品，书写一部还原“全景历史”的作品，书写一部与苏联时代的官方解释系统完全不同的作品，书写一部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褒贬与取舍的作品，书写一部凡是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都不得不读的书，于是就有了《红轮》的创作过程。

索尔仁尼琴这部浩瀚的巨著就是想用他自己认为合适的表达方式，从多个角度重现涤荡一切的历史车轮的原貌。乍一看，他写的像小说，其实他写的是历史，是一部既是“大历史”，也是个人化的“小历史”的结合之作，他是把个人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去描写，比如对斯托雷平、对刺杀斯托雷平的博格罗夫、对古契柯夫^[1]、对克伦斯基、对列宁等人个人的描写，对杜马辩论场景的描写，对二月革命爆发的描写都非常传神。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却无法拒绝这种“小说化历史”场景再现的吸引人之处。用索尔仁尼琴自己的话说：“历史性的重大步伐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细枝末节，而这些细小的东西又经常为历史所鲜知。”^[2]他的著作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1] 古契柯夫（1862-1936），十月党的领袖，共济会会员，二月革命后第一届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

[2] 索尔仁尼琴：《红轮》，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册，659页。

当然前提条件是必须对那个时代的人和事非常熟悉，因为《红轮》本身没有提供任何注释和人物介绍，而且中译本翻译的人名、地名不按照约定俗成的译法，甚至一名多译，经常要把这些人名先还原成俄语，在嘴里叨咕几遍，才能恍然知道所说的是谁。至于非专业人士读起来最大的困难，在于不知道每个出场的真实人物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在这里，我并不是给《红轮》写书评，我在这一章里重点谈的是其人其书背后的东西。

第二章的个案分析是高尔基。高尔基是苏俄文学的领军人物，也可以称做是苏联知识分子第一人，就是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舆论在他生前与死后却多次出现过截然相反的评价，对他的颂扬和抨击都堪称之最，因此在俄罗斯素有“大起大落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之称。高尔基多次转身，多次变脸，幅度之大难以想象。他从人道主义角度与列宁冲突，而后又从国家强权的角度与斯大林合作。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高尔基这个十月革命的‘异教徒’是怎么成了斯大林制度的维护者呢？”同是一个人，既是一个为被压迫者抗争呐喊的人道主义者，又是一个压迫者的谋士和吹鼓手。高尔基可以说是一个同新制度斗争但却为斯大林体制效劳的矛盾体，如果说他是真心实意的转变态度，他又从无歉疚与认错的言论，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忏悔”传统不同，高尔基怎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似乎都是对的，反正他从无产阶级海燕、从不合时宜者变成了统治者蟒蛇餐桌上家兔的供应者。他一人身扮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他是“不明就里”地在思想上步入“迷途”呢，还是由于个人形而下考虑发生的转变？一直以来，破解“高尔基之谜”被认为是解惑苏联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

正如斯大林所期盼的，高尔基在苏联文学界乃至整个苏联社会的威望无与伦比，只要高尔基顺从了新政权，其他人则不在话下。俄国知识分子与政府对抗的历史由来已久，以致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专制统治最大的威胁，是完全天然的敌人，知识分子就是叛逆和异端的代名词。有人提到‘知识分子’这个词，尼古拉说，我对这个词十分反感，应当命令科学院把这个词从俄语词典中勾掉”。^[1]可是从十月革命后，知识

[1] 谢·尤·维特：《维特回忆录》，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3年，263页。

分子的定义发生了转变，原来的“心灵反对派”变成了“一种胆怯、软弱和易于妥协的人”的标签。卢那察尔斯基把知识阶层定义为“小资产阶级”，布哈林认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外的第三阶层”，^[1]当时“知识分子气”更是一句骂人的话。^[2]从1924年、1927年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所作的两个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中就把知识分子等同于“科学技术人员”、20世纪3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就变成“脑力劳动者和受过教育的阶层”，20世纪40-50年代以后又变成技术专家。这时人们称呼的“知识分子”已经和俄罗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含义完全不同了。普京十分推崇的利哈乔夫院士曾经开了一张俄国历史上的“不朽者名单”，里面没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特卡乔夫、没有别林斯基、甚至没有赫尔岑，更没有列宁、斯大林，高尔基，但是却有阿瓦库姆，却有高尔察克，自然也有别尔嘉耶夫，那么他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筛选的呢？

第三章、第四章的内容主要是谈别尔嘉耶夫等人的《路标文集》以及相关思想。我在1990年去莫斯科的时候看到过众人抢购别尔嘉耶夫书籍的阵势，场面之火爆，比“文革”中排队购买《毛选》更胜一筹，当时的别尔嘉耶夫现象，成为知识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2003年8月第21届世界哲学大会专门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先知归来”欢迎仪式，以表示对路标派思想的重视和对他们人格魅力的尊崇。这两章是针对我上面提到第九怪，“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保守派”、第十怪：“被赶出国门的人再度热起来”的一个回应。也即“路标派”为什么会在俄国“走红”？他们解答了俄罗斯人的哪些困惑？以至于人们趋之若鹜地如同发现“先知教诲”般地争相阅读。

1990年在苏联我托朋友也买到了一本俄文版的《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在当时翻看的时候，我就不明白谈俄国共产主义起源为什么不从马克思主义传播谈起，不从工人运动谈起，而是从宗教谈起，从知识分子谈起，从无政府主义和激进主义谈起，从民粹主义谈起，莫不成这些都与俄国

[1] 郑异凡：《苏联知识分子问题和布哈林的“奇谈怪论”》，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7年第2期。

[2] 李可夫：《十月革命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任务》，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171-179、180-186页。